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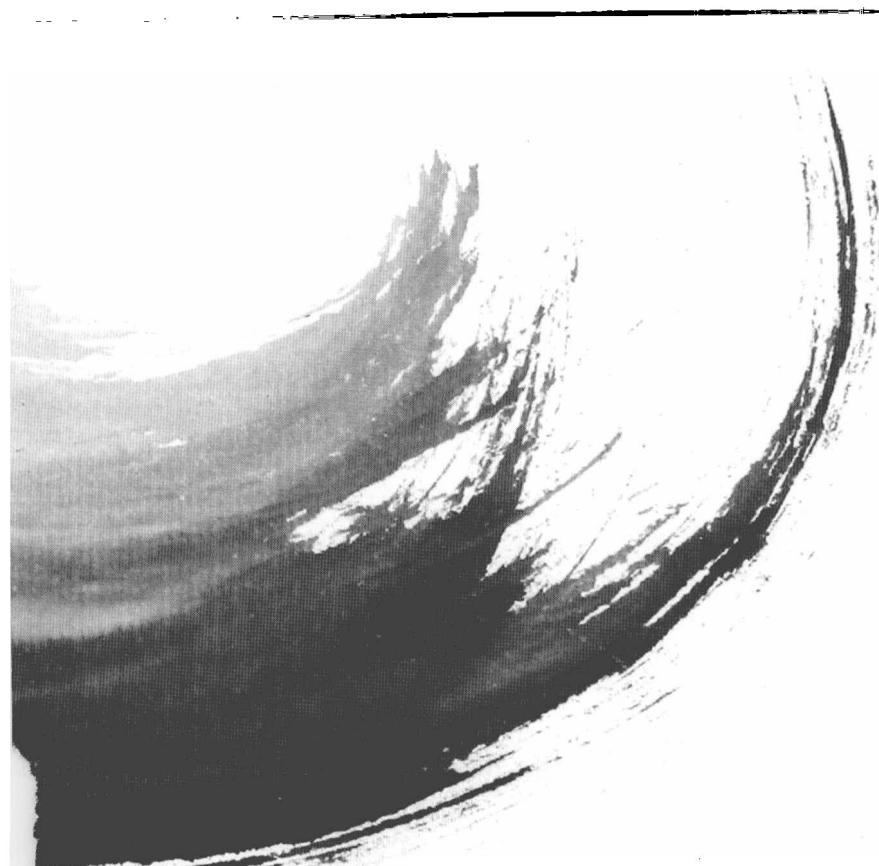
现代性视阈中的 大众化诗潮

(1917-1949)

Xiandaixing Shiyuzhong de
Dazhonghua Shichao (1917-1949)

邓晓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性视阈中的 大众化诗潮

(1917-1949)

Xiandaixing Shiyuzhong de
Dazhonghua Shichao (1917-1949)

| 邓晓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视阈中的大众化诗潮(1917~1949)/邓晓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04-8059-4

I. 现… II. 邓…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1917~1949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135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大众化诗潮研究的动因与意义·····	(1)
第一章 现代性及大众化诗潮的现代性·····	(16)
第一节 现代观念中的“大众”与“大众化诗潮”·····	(16)
第二节 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理解·····	(23)
第三节 大众化诗潮的现代性特征·····	(38)
第四节 大众化诗歌: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55)
第二章 大众化诗潮现代性的发生与诗歌平民化运动·····	(66)
第一节 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与大众化 诗潮现代性的发生·····	(66)
第二节 白话化:诗歌语言工具的现代转型·····	(73)
第三节 “诗体大解放”与诗体形式的现代探求·····	(79)
第四节 诗歌平民化的理论与实践·····	(88)
第三章 大众化诗潮现代性的展开与诗歌大众化运动·····	(113)
第一节 大众化:诗歌集体话语模式的展开·····	(113)

第二节	诗歌功利性的凸显及其矛盾·····	(120)
第三节	诗歌大众化的文体策略·····	(126)
第四节	“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诗派和 诗人个案论析·····	(143)
第四章 大众化诗潮现代性的演进与诗歌的 民族形式想象····· (177)		
第一节	民族话语背景与诗歌大众化的深入·····	(177)
第二节	创作主体:诗人的大众化与大众的诗人化 ·····	(192)
第三节	诗歌文体建构的包容性诉求·····	(201)
第四节	民族的呐喊与艺术的融合:诗派与 诗人个案论析·····	(211)
第五章 大众化诗潮现代性的反思····· (286)		
第一节	反思之一:审美性与功利性的纠缠 ·····	(286)
第二节	反思之二:就雅与从俗的矛盾 ·····	(292)
第三节	反思之三:文体范型与标准的冲突 ·····	(298)
余论 大众化诗潮的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 ·····		(312)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5)

引 论

大众化诗潮研究的动因与意义

1

从现代性维度来看，“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都是文学现代性展开的一种向度，在“五四”新文学那里，这两者总体上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而后来却往往以悖论的方式呈现出来：要么是前者提上日程，要么是后者走到前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本是现代性内部矛盾性的体现，而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成一种绝对的紧张关系。作为九叶诗派重要理论家之一的袁可嘉，也曾认为带着生命本位的“人的文学”与带着人民本位的“人民文学”之间，只要双方不走极端，其中有些流弊是相对可以避免的。^① 因此，当试图从现代性视阈进入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潮这一研究对象时，笔者更愿意关注的是两者从不和谐中求得和谐的张力，而不在于是此非彼的对立观念和坚执一方的独占立场。

^① 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7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先后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许多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作家、诗人成为被排斥的对象,现代主义诗歌也遭受贬抑。虽然“由象征主义为滥觞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思潮,是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潮流”,但它“自50年代初开始,多年来被文学史家们所忽略或贬低”。^①新时期初,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总体上仍以政治做评价标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作家和作品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直接催生了把文学还给文学本身的呼唤。于是有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及其实践,有了启蒙主义的文学研究范式。个性解放、主体性、现代人格、自我表现、知识分子立场和现代审美意识等,成为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文学回到它自身、让现代文学回到它自身的真实的努力。因此,以前那种将现代主义诗歌刻意贬低的狭隘的诗学观得以改变。

但问题在于,当现代主义诗人和诗歌受到重视时,对左翼诗歌、大众化诗歌,甚至整个现实主义诗歌的评价又因此走低。与当初有些人把人性和个性解放、自我表现等启蒙内涵视为与马克思主义不兼容的资产阶级因素一样,启蒙主义范式又将马克思主义与此类启蒙理念对立起来,认为革命作家、左翼文学为了救亡和革命而排斥、压抑人性和人的解放,忽略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放弃和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屈服于陈旧、落后、浅薄的工农大众的思想意识与审美习惯等。因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之下,它仍旧采取了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只是与自己要冲击的对象在立足点上不同而已。这种对启蒙与文学的理解,也是“从‘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二者相冲突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动态规律或重构文学

^①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史”，“这种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前者被理解为作为政治——社会学或国民性——文化意义上启蒙的工具，后者被界定为是一种拒绝了社会功利性的文学‘自律’中的启蒙，即审美意义上的启蒙”，因此，这就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启蒙人为地、机械地分割开来，即认为前一种启蒙本与文学没有多大的本质关联，只是被外在地加于文学之上，使文学堕落为‘工具’；而后一种启蒙属于文学的‘本质工作’，是文学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价值尺度。这种理解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启蒙思想结构中美的范畴与真的范畴、善的范畴对立起来或彼此孤立起来了。”^①

事实上，上述范式涉及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复杂性质，体现了现代性整体工程的不同侧面。应该承认，不论是强调文学独立性和个体独立性，还是侧重文学的社会性与阶级主体性、民族主体性追求，其现代性展开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和缺失，而其缺失以及不和谐正是我们需要反思和修正之处。我们应着眼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其重构，而不只在于反动和颠覆。由文化霸权、极权政治所带来的个体自由的丧失、民主的泯灭、人性的压抑等方面的后果，使文学的生产者和批评者再度觉醒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但与此同时，其社会职责中的历史承担和政治内涵，似又不应完全抽空。所以，现代性视阈的选取，对新诗和新诗研究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对现代大众化诗潮来说，也是如此。

与对现代性不同侧面的强调相关，也就有了纯文学、纯审美与功利主义文学观这两种向度的对立。对诗歌而言，大众化和纯诗化是中国现代两股重要的诗歌潮流。虽然它们也有过合流与融合，但总体上却存在对抗和冲突，都曾或被视为逆流，或被视作毫无意义的非诗。但是，当我们回眸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时，不应再持偏执任何一

^① 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端的观念。孙玉石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说：“包含象征主义在内的中国新诗现代主义潮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新诗发展的‘逆流’而受到贬抑。80年代初以来，学术空气与学术研究的正常化，逐渐改变了这一狭隘的文学观念。事实说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不仅不是新诗艺术发展的逆流，相反，它在中国新诗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同其他流派的诗潮一样，尽了自己的一份社会承担和艺术探索的职责。”^①这番话无疑是客观的。但他显然并非只要认识现代主义诗潮曾被视为逆流而遭贬抑的事实，而反过来又对现实主义诗潮（包括大众化诗潮）进行排斥。相反，他同样指出，在纯文学话语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对现代主义新诗的研究趋于膨胀。因此，在打破了一种不平衡观之后，又出来了另一种不平衡观，新诗的现实主义潮流又被冷落、忽视或被刻意贬低：“新诗的现实主义艺术潮流和诸多创作现象，确然是近二十年来一个多少被冷落了的研究领域。专心致力于新诗研究的学人中，曾有提出极端一点的意见，根本从理论上否认新诗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和创作潮流的存在。”^②诚然，现实主义诗潮曾被视为主流、正宗甚至唯一，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现代主义诗歌研究逐步升温的同时，我们并没有以一种更接近客观和真实的态度来同样对待现实主义诗歌。而大众化诗歌则更是如此。因此，其结果就必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许多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解，差不多就只剩下了现代主义诗歌。其实，这两股诗潮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独特的审美追求，但又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现代主义诗潮也好，现实主义诗潮也罢，纯诗化取向也好，大众化追求也罢，其成绩和不足、意义与缺失都应结合具体社会文化语境来考察，以在此基础上找到新诗文体

①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② 孙玉石：《中国现实主义新诗艺术散论·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建构和发展的最佳路径。

大众化和纯诗化这两股诗潮，呈现了中国新诗现代性整体工程的不同侧面，它们之间的矛盾主要因现代性的主体性追求的差异而产生，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新诗中的体现。其双方的缺失都值得我们反思，但要裁判出任何一方的独占地位，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发生及展开，本来也与现代思想观念和现代政治、文化难以分开，诗人和诗歌都与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承担连在一起。所以，纯审美的观念和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对象那里，难免会遭遇到尴尬。当年，在有人不承认有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劳苦生活的诗是诗，也有人认为象征派的诗只是于人生毫无益处的玩意儿时，朱自清便指出：“这种论争原是多少年解不开的旧连环。就事实上看，表现劳苦生活的诗与非表现劳苦生活的诗历来就并存着，将来也不见得会让一类诗独霸。那么，何不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类兼容并包，放弃了正统意念，省了些无效果的争执呢？”^①他在谈及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研究时也表明了对多种文学观念相互融合的预期：“这二十多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的著作开始，我们有了几部有独见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上卷着眼在白话正宗的‘活文学’上，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着眼在‘时代与民众’以及外来的文学的影响上。这是一方面的进展。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着眼在各时代的文学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学以外的种种影响。这是又一方面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相辅相成，将来是要合而为一的。”^②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新诗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

① 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1页。

② 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209页。

与西的文化冲突以及其自身的矛盾冲突中，甚至到了世纪之交，人们还在不断地追问和论争：新诗究竟有没有形成自身的传统？新诗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不管论争者持何种立场和对这些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问题的提出和论争本身就说明，新诗的现代性还远未完成。基于此，笔者试图从现代性视阈来考察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潮，并在对其反思的基础上，表明现代性的重构和宏大叙事的必要性，以力图为新诗的建设和发展寻求合适的路向。

二

关于大众化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和大众享有文学艺术的合法性，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都有过论述。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高度强调了文艺与大众的密切关系，认为文艺在大众手中则活，而离大众之手则死，大众是文艺之创造者，而文人则是模仿者，他们把大众所创造出来的文艺腐化了。鲁迅也曾谈到民间大众创作的重要性及其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么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①

①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页。

郑振铎则认为“俗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① 它“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因为正统的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当民间发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起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形式了，渐渐的这种的新文体得了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的支持了。渐渐的这种新的文体升格而成为王家贵族的东西了。至此，而他们渐渐的远离了民间，而成为正统的文学的一体了。”^② 尽管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对大众化文学的推崇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它也确实是文学中不可否认的一员。

在前现代文学中，虽则大众化诗歌也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它远非一个自足的发展体系。即便说文学最初起始于大众，即便完全不识字的人，也一直在参与着文学的创作，即便是最下层的民众，也应有享受文学艺术的权利，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原因，大众化文学不得不受到种种限制，其创作、传播和接受的范围都极其有限。而且，文学艺术观念上的尊雅卑俗，几乎是一个常识。贵族化的就是“雅”的、富于诗意的，因而居于正宗和领导地位；平民化、大众化的则是“俗”的，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处于被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 页。郑振铎先生说：“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②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3 页。

压抑、被排斥、被漫画、被歪曲的境地；前者是正、是古，所以是美的、深刻的、有价值的；而后者则是淫、是邪，所以是丑的、浅薄的、没有价值的。对诗歌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诗歌在中国一直是一种最资深的“正统文学”和“贵族文学”。然而，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和展开，大众化诗歌有了发展的契机。“新文学酝酿诞生之初，人们对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本源性联系早就注意到了。”“而新诗大众化的要求，则是在新诗运动初期就提出的，是与诗歌的现代性转变与生俱来的。”^① 大众化诗歌将诗歌由一种最资深的精英文体转变为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文体，由一种在题材内容和精神、文体形式、创作主体等方面都倾向于贵族化的文体转变为平民文体，其现代性意义也就此呈现出来。后来茅盾在评价抗战以后的诗歌时，对朗诵诗、街头诗、民歌体等大众化诗歌运动给以肯定，对诗人们“大胆地要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地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中”的努力，表示“一定要珍视，一定要赞美”，并认为，“如果‘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是对于旧体诗的解放运动”，那么，这种“紧紧抓住了大众化的方向”的诗歌运动，便是“对于白话诗的再解放”。^② 然而，鲁迅先生当年也曾指出：“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③ 他认为发展大众化的文艺固然是急务，但它的实现，须借政治之助力，而难以一条腿走路。因此，现代大众化诗潮也有一个曲折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在笔者看来，白化新诗的发生与新诗的平民化运动、新诗的大众化运

① 许霆：《中国现代诗学史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② 茅盾：《为诗人们打气》，《茅盾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③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1页。

动、新诗民族形式的倡导与实践、新民歌运动等，大致体现出了其现代性演进的基本线索。本书所论述的大众化诗潮，时间范围从白话新诗正式发生的1917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所以重点选取了上述几方面作为代表性对象，从现代性视阈对其文体内部和外部加以考察，并结合具体诗人和诗歌流派进行论析，以呈现大众化诗潮的总体发展趋向，揭示其与启蒙现代性及纯审美观念之复杂关系，表明其存活和发展的条件、价值和困惑。另外，对大众化诗潮的现代性进行反思也尤为必要。在其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和尚未解决好的问题：首先，对诗歌功利性的强调，其危险性是使大众化诗歌成为政治、功利的附庸，从而导致口号化、概念化、“非诗”化。因此，其功利性与审美性之间如何平衡，仍值得我们反思。其次，对大众主体性的追求，其难处在于普及和提高的协调，往往不仅造成艺术和审美上的缺失，也造成诗人主体的缺席。故而，个体与集体、个性与共性如何达成和谐，仍需要我们去追问。再次，对旧形式、民间形式的标举，其危险性是对西方诗歌资源的极端排斥，从而导致诗艺和新诗文体的封闭和狭隘。所以，中与西之间如何平衡，也值得我们再探讨。上述几个方面，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中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主体性问题、中与西的冲突等问题的表现，也是现代性的内部矛盾性的体现。

当然，对大众化诗潮进行反思也应力避片面和极端。如关于其艺术性问题，需要结合时代环境、诗人的身份和生活、诗人的才华等方面的因素加以考察。大众化诗潮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民族和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相伴相依，它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难以分解的关系。而且，它与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结，并非一开始就是要使文艺（诗歌）本身沦为政治的奴仆和附庸，恰恰相反，它却是对危害和阻碍民族与人民自由、独立、解放的反动政治的一种反动。从艺术上来说，由于要使大众易

于接受，要为广大众所喜闻乐见，许多作品流于粗浅，但却不同于庸俗和粗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粗”也是对过于追求华丽纤巧的诗风的一种反动，所追求的是一种“力”的美。臧克家曾说：“现在，我们向诗人要求的诗句，不是外形的漂亮，而是内在的‘力’！”^① 陈残云也曾对“标语口号”一类的指责加以申辩：“有人说，我们的诗粗制滥造，许多政治口号。这大概是远离烽火，躲在咖啡馆里的诗人信口开河。政治口号有一些，并不‘许多’，粗也很粗，并不‘滥造’。”“诚然，我们的诗思想性比较强，而艺术上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一个弱点。”“这与战友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余裕的闲情去作精雕细琢有关，也许又和我们的才华有关。”“我们并不是没有苦闷，并不是不懂得爱情，并不是不知道人们的心灵有创伤，并不是不会说朦胧话和软绵绵的细语”。^② 此外，现代大众化诗潮本身也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不可能一产生就至于成熟。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分析其得失；另一方面，有些大众化诗歌在艺术上还存在某些不足，但似乎不宜因此而否定其整体和全部，不宜因诗歌大众化曾成为一种极端的政治话语，进而完全贬斥整个大众化诗歌。有论者在谈到朦胧诗不以妇孺皆懂和群众喜闻乐见为追求时说：“当代诗歌在几十年中已经充分发展起了一种创作模式。除了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标准化和诗人真实自我的隐退之外，重要的内容还有情绪内涵上的充分政治化和表现形式上的充分大众化……‘文革’结束之后的现实主义诗歌虽然以说真话和抒真情的显著特征而改变了伪浪漫主义的虚假，结束了以‘瞒和骗’充当帮派政治工具的时代，但是，它却没

① 臧克家：《新诗片语》，《克家论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② 陈残云：《南国诗潮——〈中国诗坛〉诗选·序》，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有改变大众化的艺术方向。”^①（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对诗歌走向工具化的极端进行反思诚为必要，但若认为只有反对大众化、改变大众化的艺术方向，才是诗歌唯一的艺术追求，认为艺术只能雅而不能俗，甚至连雅俗共赏的追求也是不应该的，就未免走向了另一种片面和极端。

人们总是习惯于作这样的评价和判断：或将集团、时代与自我、个性割裂开来，认为二者不兼容，或将政治性与艺术性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仇敌，从而导致纯诗和大众化的各执一端，一方指认另一方的“俗”和“非诗化”，而一方又贬斥另一方的“雅”和“贵族化”，这样或者造成了诗歌写作对时代的疏离、对大众的隔膜、对现实的不在场，或者造成了诗艺上的封闭和狭隘。

三

在回眸新诗的发展历程时，一味否认其传统和成绩，当然不无片面，但不正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新诗的文体建构和发展也有所不利。而在新诗的诸多教训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存在多组矛盾与冲突：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欧化、大众化与纯诗化、自由化与格律化、共性与个性、大我与小我、时代风云与日常生活、情感与理性、叙事与抒情、优美的书面语言与通俗的日常口语等。对于诗歌艺术而言，它们并非天生相互冲突和排斥，而应可以融合一致。但由于特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诗学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对抗长期存在。而在上述种种对抗中，大众化和纯诗化的各趋极端，给新诗的发展带来了

^① 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2—233 页。

消极的后果：大众化潮流对功利主义的追求往往容易导致诗歌工具主义误区，忽视诗歌的审美价值，对共性的追求往往又容易使诗人丧失个性，对民族化的追求又往往容易造成对欧化的极端排斥，导致诗艺和诗歌文体上的封闭；而纯诗化潮流坚持纯艺术主义观念，又往往容易完全驱逐诗歌的社会意义，对个性的诉求又往往排斥共性，而且在诗艺与文体上又往往容易走欧化的极端。因此，它们都存在一定的偏颇。这种多极端、多对抗而少和解的倾向，致使新诗文体现代性建构严重滞后。

当然，我们并不能对它们各自的现代性探索完全否定。纯诗化潮流作为中国新诗现代性展开的一脉，虽然在现代中国具体文化中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但“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到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人，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群，这些不断涌动的现代主义诗潮明确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先锋性质。”^①当然，除了体现出了较强的先锋性、具有无可否认的开放性之外，它同时又不可能完全脱离本土文化与诗歌传统，故而自然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民族性特质。现代主义诗潮“内接中国传统诗歌注重含蓄内蕴的一路，外近世界诗歌以新的艺术方法贴近现代生活脉搏的新潮。在古今中外的吸收、消化和融会中，努力探求一条民族诗歌通向现代性的途径。他们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造了东方象征派诗和现代派诗的基本范式。”^②当然，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坚持着艺术和审美的独立性，接纳和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但却缺乏对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内涵。而在当时中国血与火的激荡现实下，它也显然难以有充分的发展空间。故而，许多一开始带有唯美倾向的诗人，

① 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②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